

第二章 中共大國外交與夥伴關係形成

「理論」不僅歸屬於「意識型態」的範疇且客觀的存在，卻因人、事、時、地、物的不同，經由指導性及約束性的整體運用後，產生結果相異的的效用與效益。¹ 本章節將探討中共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對冷戰後，國際體系觀察，提出以「和平發展」為架構之「鄧小平國際政治理論」，其後的繼承者江澤民、胡錦濤在遵循該理論的同時，如何與時俱進結合現實的國際社會時空環境，因應客觀形勢的變化，擘劃有利於中共崛起的外交政策及具體作為，本章節將依據中共領導人對國際現勢環境下，適時修正國際政治理論，並以國家利益的面向探討，如何形塑「大國外交」，再以「新安全觀」之論點探討「夥伴關係」及建構「國際新秩序」的關聯性。

第一節 中共領導人對國際格局之認知

國家的內政與外交之政策，向為國家整體施政的一體兩面，而國家領導人的領導風格素來是定奪政策及重要影響者，進而導引國家對外策略的動向，而共產國家的領導人更甚於一般民主國家，鑒於中共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在外交策略及作為上，不僅對中共在冷戰期間的對外關係，具有關鍵性之影響，尤使中共在兩極對峙的國際體系中，得以在美、蘇在兩強之間折衝，遂行「權力平衡」以獲取國家的最大利益。是以本節將針對中共第二、三、四代的領導人，在冷戰後對國際格局認知的角度，進行探討。

一、鄧小平期間

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時，主張「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打倒華國鋒主張的「兩個凡是」²，順利接班成為中共第二代領導人；接著對當時中共黨內存在的錯誤傾向，提議要在「毛澤東思想」的論斷及引導下，必須進一步的理解及準確的認識；³ 是以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講話中指出，以馬克斯思想及毛澤東思想作為「解放思想」的指導，而「實事求是」

¹ 李景治、羅天虹等著，《國際戰略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頁33。

²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持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的遵循。

³ 顧德欣，《鄧小平國際戰略思想研究》（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2刷），頁1。

不但是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基礎，更是馬克斯主義的思想基礎，以及過去革命所取得一切勝利的根基。⁴ 由上可知，鄧小平在凸顯世界變化的同時，更透露出思想與行動亦要隨之而變，期使主客觀環境、理論與實踐能夠相互符合。基此，「鄧小平國際政治理論」的核心思想即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八字方針；另在「三個有利於」⁵ 發展經濟理念下，將國際政治主題由「戰爭與革命」轉為「和平與發展」，然後依此架構國際政治之大戰略理論，再衍生成為外交政策及具體方針。

「獨立自主」是馬克斯主義國際戰略思想的主要堅持原則之一，當年馬克斯與恩格斯即一再強調，「國際聯合」絕不能否定各個國家與民族的獨立，亦不能否定各國政黨的獨立自主。⁶ 毛澤東依此提出：「中國必須獨立，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做主張」；⁷ 周恩來更是明確指出：「外交問題有一個基本立場，即中華民族獨立的立場，獨立自主、自立更生的立場」；⁸ 基此，中共自建政以來，依據「獨立自主」策略，作為新中國外交的出發點，以及對外關係的基本原則，並制訂「另起爐灶」、「打掃乾淨房子再請客」的方針，無非在保障中國「獨立自主權」的總體實現。

「國家主權」是國家在處理國內及國際事務之際，不受其他任何國家干預或限制的最高權力。⁹ 聯合國於一九七〇年頒佈《國際法原則宣言》，其中明確將國際社會中各國主權平等原則列為國際法的基本原則之一，並規定主權平等的六個要點。¹⁰ 鄧小平遂行「改革開放」政策後，對「獨立自主」意涵賦予新的時代意義，摒棄閉關自守改倡議國家的主權獨立及行使主權的自主性，強調每個國家可以依據國情不同，自行制訂及執行以維護本國根本利益的外交政策，上述所為不僅不允許任何外來勢力的干涉與侵犯，亦不依附於任何大國與國家集團，並以此立場處理國家對內及對外的一切事務。¹¹

⁴ 《鄧小平文選（1975至198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2刷），頁131-133。

⁵ 有利於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生產力；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基的綜合國力；有利於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⁶ 同註3，頁123。

⁷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頁1465。

⁸ 《周恩來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頁321。

⁹ 萬建偉主編，《世界外交知識詞典》（浙江：杭州出版社，2001年版），頁6。

¹⁰ 法律上一律平等，享有主權的固有權力，有義務尊重他國的國際人格，國家的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不受侵犯，各國均有權利選擇政治、社會、經濟及文化制度，有責任履行國際義務；梁守德、劉文祥，《鄧小平的國際政治理論》（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頁135。

¹¹ 國防大學訓練部組編，《鄧小平理論》（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頁374；梁守德、劉文祥，《鄧小平的國際政治理論》（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頁155。

鄧小平在遂行「獨立自主」政策時，即不斷發表談話並予呼籲：國家要取得真正的政治地位，在經濟政策和外交政策上都要自立自足；不要指望中國作他國的附庸；為利世界和平，堅持擁護和平，反對搞戰爭與霸權……。¹² 一九八二年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政治報告中，甫正式揭櫫「獨立自主」政策；¹³ 惟其內容僅是概略性的論述立足點。直至一九八六年中共總理趙紫陽在〈關於第七個五年計畫的報告〉中，才首次在官方文件中，正式確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內容與基本原則。¹⁴

冷戰後，中共以「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建構外交政策總方針，除堅持社會主義國家路線外，在意識型態上改以注重實事求是及國家利益。¹⁵ 是以中共外交部前部長唐家璇在一九九八年指出，「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分為：堅持獨立自主；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至於「獨立自主」政策的核心要點為：國家的主權和安全始終放在第一位；反對霸權主義；真正不結盟；根本的問題是中國自身的發展。¹⁶

鄧小平的「獨立自主」政策，係以「和平」作為整體概念的主軸，強調惟有實現和平才得以順利發展經濟，進而使國家整體國力的提升，使國家在對外關係上獲得應有的國際地位，在外交策略上掌握主動權；另在相互依存的國際體系中，對外關係上不單是要有富朋友，還要有窮朋友，操作層面上還有合縱連橫的相互關係，所以「獨立自主」意謂主動權操之在我，而「和平」旨在以和為貴，藉由「相互依存」換取周邊及國際安全環境，如此國家才能積極從事經濟的發展。

國際關係互動皆在以國家為主體的架構下運作，依據斯賓諾莎（Benedict de Spinoza）的「自然權力」（Natural Right）¹⁷ 概念指出，在自然狀態下的「國際關係」並無信義與義務的關係存在，即每個國家都在謀求自身的利益，猶若是「

¹²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頁202、266、3、156。

¹³胡耀邦，〈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頁39-46。

¹⁴趙紫陽，〈關於第七個五年計畫的報告〉，《中共年報1987》，（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民國76年版），頁6-75~6-77。

¹⁵Robert A. Scalapino, 《In Quest of National Interest --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Yu-Ming Shaw, ed., 《Power and Policy in the PRC》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5), p. 137; 轉引自《2000年國際關係學報》，（台北：政大外交學系，2001年版），頁126。

¹⁶唐家璇，〈在鄧小平外交思想指引下勝利前進—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外交工作回顧〉，《求是》第20期（北京：1998年5月16日），頁33-34；轉引自《2000年國際關係學報》，（台北：政大外交學系，2001年版），頁132。

¹⁷宇宙間的各種東西，都有權利用其與生俱來的種種力量，以保存自己的生存。（國立編譯館大學用書編審委員會主編，《西洋政治思想史》（台北：國立編譯館，1987年臺二版第七次印行），頁144至145；《神政論》，（"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 Chap. XV1）。

強權即公理」的世界。¹⁸ 華爾滋指出「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導致「安全困境」，此是影響「國家不安全」的關鍵原因。¹⁹ 然而國家發展與國家安全實為密不可分，且完全服膺在國家利益之下，是以國際政治間主要關係完全著眼於國家的長遠利益。²⁰ 英國著名外交家艾克勞爵士（Sir Eyre Crowe）指出，「國家利益」首要在維護國家獨立，但不全然是指國家安全，而是安全加上繁榮。另有謂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應從國家的戰略利益出發，基此對外政策是中國「國家利益」的根本所在。²¹ 是以冷戰後，鄧小平體認到國際情勢已由「戰爭與革命」轉向「和平與發展」，遂強調日後中共的「國家利益」，以超越國與國之間的意識型態及制度分歧。

中共在面對「六四天安門事件」及「蘇東波浪潮」時，依舊是堅持維護「國家主權」及保衛「國家安全」，以確保「國家利益」作為首要之務。惟中國大陸經濟長期以來處於停滯落後狀態，係因閉關自守政策所致，但歷史經驗證明閉門造車是無法成功，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另從世界角度之，中國的發展對世界和平與世界經濟的發展有利。²² 鑒於國際政治運作時，應以維護國家主權及反對強權政治，作為鞏固「國家利益」的核心策略，所以不僅要「韜光養晦」，在辯證統一的关系上，要「絕不出頭」與「有所作為」相互運用，尤其是在國際戰略層面的表現上要沈穩，再在綜合國力基礎上，以政治大國地位參與國際事務時，處事公正以彰顯為負責任大國。惟因一九八〇年代中期，國際政治戰略思想即從國家安全核心轉變為以經濟安全，凸顯出中國的國家利益、各國家間的利益、全球利益具有相互關係。基此，鄧小平在「三個有利於」條件的構思下，主張國家利益的核心有：安全利益：包括國家主權、安全與穩定，領土的完整和統一；政治利益：首要之務在國家穩定；經濟利益：表現在經濟發展和實現四個現代化，更代表人民最大利益及根本利益。²³

針對對外關係，中共一向主張尊重雙方面的利益而不追求單方面利益，以作為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準則，以致在對外關係上，透過「國家利益」作為衡量

¹⁸ 國立編譯館大學用書編審委員會主編，《西洋政治思想史》（台北：國立編譯館，1987年臺二版第七次印行），頁150至151。

¹⁹ 幼獅文化事業公司編譯，Fred I. Greenstein、Nelson W. Polsby 主編，《國際政治學》（*International Politics*）（台北：幼獅文化圖書公司，民國79年4版），頁333。

²⁰ 同註12，頁330。

²¹ 俞正梁等著，《大國戰略研究：未來世界的美、俄、日、歐（盟）和中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頁349。

²² 同註12，頁78、79、344至348。

²³ 梁守德、劉文祥，《鄧小平的國際政治理論》（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頁123-144。

雙邊及多邊關係上的輕重與利弊時，即可說明在恢復「中」、美關係上，主張彼此都讓點步，總能找到兩全其美的辦法；在「中」、日關係上，強調雙方應從長計議，並顧及彼此國家與人民之間的合作利益；在「中」、歐關係上，應繼續打交道、搞好關係；在面對第三世界國家時，則宣示雙方是生命共同體並具有休戚與共的利益。

依據「唯物辯證法」指出，世上一切事物無恆常不變的規範，凡對在認識事物、問題分析及解決矛盾時，必須統觀全局，而不能顧此失彼。²⁴ 當面對各種環境的變局，惟有通過實踐才能發現、證實及發展真理，俾在改造客觀世界時，亦進行主觀世界的改造。²⁵ 美國前總統尼克森在一九七一年時即指出，現今的國際社會呈現出美、蘇、中、日、歐等五大主要國家力量；此後「五大力量中心」說，則廣為美、蘇、日國家的學者引述。²⁶

一九九〇年初，鄧小平於在〈國際形勢和經濟問題〉講話中明確指出，所謂「多極」的國際格局，「中國」應算是一極，至於蘇聯雖然國力不若往昔，但仍是多極世界格局中的一員。²⁷ 值此後冷戰時期，中共官方及學者即不斷主張國際社會體系中的主要大國之間，已因權力消長而形塑成「多極化」的國際格局輪廓。²⁸ 一九九三年李鵬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蘇聯解體標誌著兩極格局的終結，當今世界正朝着多極化方向發展；其後的中共官方文件，即將國際格局朝多極化發展，列為「對外政策」的指標性策略。

冷戰後中共開展全方位的開放性外交政策，並加強與國際間往來，以防範西方工業七國（G7）藉由首腦會議從事霸權主義及強權政治；再者，基於國際環境的現實考量，對外採取秉持睦鄰友好原則，積極發展與週邊國家的關係。²⁹ 三者，中共是後冷戰僅存的社會主義大國，對於國際問題的處理次序取捨，已由「東西問題」改為以「南北問題」為主軸，並依此建構「國際新秩序」；³⁰ 中共前外長錢其琛遵循鄧小平思想的指導，於一九九二年九月在聯合國大會演說時謂：「國際新秩序」必須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基礎，如此才合乎聯合國憲

²⁴彭光謙等編，《鄧小平戰略文選》（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頁309。

²⁵《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年版），頁259-273。

²⁶A. E. 鮑文《力量中心-理論與實現》、小川明雄《美中蘇日歐-世界的五極結構》、保羅·甘乃迪《大國的興衰》、約瑟夫·奈《美國定能領導世界》。

²⁷同註12，頁353。

²⁸熊云，《面向21世紀的國家發展戰略》（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1年版），頁4。

²⁹同註3，頁63-79。

³⁰江振昌主編，《國際新秩序的探索與中共》（石田收，二十一世紀中共政治結構的問題：社會主義意識場經濟和一黨專政能否兩立）（台北：政大國關中心，民國82年版），頁62。

章的目的與原則……。隨者世界朝向多極化發展，才能實現和平、安定、公正且合理的國際新秩序。

針對「和平與發展」的國家政策主軸下，鄧小平不斷強調對外政策即在創造和平的國際環境，以實現四個現代化，惟此中國必須較世界上任何國家更需要，對國際局勢的和平與穩定更為關心，為因應世界局勢的在變化，都在考慮相應的新政策，除「和平共處」原則外，更應注重國家利益及安全，並透過聯合國等國際組織，根據《聯合國憲章》以安全機制為核心，建立國際民主機制，使國際關係體制化，各國形成相互依存的關係，藉由多極化體系型塑國際經濟及政治的新秩序。「南北問題」引發國家利益由安全利益轉為經濟利益之爭，已為冷戰後各國對內對外的主要政策指標，但先決條件是在和平的國際環境，惟中共為能實現「四個現代化」，提升綜合國力、國際地位，遂以「和平與發展」作為國家發展政策的主軸，並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構築對外政策之基礎，再衍生為國家之間關係的平等主權、互惠互利的相互依存，進而以國際格局中的大國姿態，再透過睦鄰友好關係型塑「多極化」共存共榮之國際格局。

二、江澤民時期

「中國威脅論」或「黃禍」之說，在冷戰後即於日本、歐美及亞洲地區之學界及媒體報導蔚為風潮；³¹ 有學者指出，中共精英份子至今仍崇尚以大陸為中心的世界觀，目前與其他國家的夥伴關係等外交作為，僅是圍地謀和的外交策略及實施手段，最終將藉由維護國家主權、維持周邊安全等作為，建構區域霸權及全球霸權。³² 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則是明確指出，冷戰後無一國家能挑戰美國的超強大國地位，關於中共崛起將為全球大國之說，基於現實層面的評估，現階段僅能在區域稱雄而已。³³

冷戰後的國際體系，面對兩極格局的終結，針對多極化世界格局的發展，其過程與發展並非偶然，而是歷史大變動後的進步，探究原因係由於戰後世界經濟

³¹日本防衛大學村井友秀在 1990 年 5 月《諸君》發表「論中國這個潛在的威脅」；美國《國際先鋒報》在 1991 年 1 月 9 日刊登載〈東南亞國家為防備中國而紛紛加強海上防禦力量〉；《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在 1992 年 1 月 3 日刊登〈東南東南亞人謀求美國作出 安全保證〉等。

³²李威儀譯，毛思迪（Steven W. Mosher）著，《中國新霸權》（台北：立緒文化公司，民國 90 年版），頁 133-159。

³³林添貴譯，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大棋盤》（台北：立緒文化公司，民國 87 年版），頁 249-251。

政治發展不平衡所致，構成因素係為綜合國力與實力產生對比的變化，國家利益衝突與經濟政治體制的矛盾，主要國家的決策與結盟戰略調整。³⁴ 是以中共尤其強調冷戰後的國際體系呈現「一超多強」格局，而「中國」正好處在成為大國與強國之間的歷史轉捩期。

經濟全球化是當今世界發展的客觀進程，是在現代高科技的條件下經濟社會化和國際化的歷史新階段。西方戰略家自一九八〇年代起，即從歷史角度觀察進行研究有關「中國崛起」的戰略性問題，並在「經濟全球化」及「確立世界市場地位」的目標下，指出「經濟實力」和「戰略地位」即為「中國崛起」的為兩大指標。面對無政府狀態下的國際體系，各國惟有透過各種形式化的權力展現，致使國際社會呈現汰弱存強的機制，但在體系的結構下，國家多因內在社會結構的改變，而形成外部國際社會結構的重大變遷。³⁵

般鑑近代新興國家的崛起，無不與本國內部及外部的主客觀環境相呼應，內部為國土大小、人口多寡、自然資源豐瘠、政治與社會穩定、經濟科技發展等綜合國力有關，外部則端視世界領導國對國際局勢的態度而訂，或選擇軍事力量或採取經濟手段不一而足。惟每個國家無不汲汲營營的欲成為國際社會中的強中之強，以謀取國家的最大利益，但在成為霸權強國之前的大國崛起過程中，學者莫德爾斯基（George Modelski）指出，依據世界政治大循環的研究途徑可知，近五〇〇年以來，崛起的大國凡挑戰世界領導者皆是以敗北收場，而當代的國際體系領導者在權力式微時，以英美為例係採取「禪讓」方式，大英帝國將國際社會中的政治權力，以和平方式轉交先前的主要夥伴國家美國。

針對一般大國多服膺世界領導者的領導，並加入霸主國家所主導的國際體制，一般大國雖將因此損及國家之核心利益或是重要利益，反觀若採取抗爭立場，恐將斷傷大國的自主獨立、國家安全及基本福利，進而遑論國家的成長與茁壯；基此，中國在現有的國情、國際政治的規律性，應可交相運用「自助」（self-help）、「不出頭」（hiding）、「搭便車」（band-wagon）三種方式，成為國際體系中具舉足輕重且有長期性國際政治抱負的大國。³⁶ 學者有鑑於此建議採取以下具體步驟：首先必須蓄積國力；次者避免直接挑戰當今霸權國家；三者與現在的霸權國

³⁴同註 3，頁 55-62。

³⁵黃仁偉，〈中國和平崛起與軟力量建設〉，《文匯報》（香港），2003 年 12 月 23 日，
<http://www.whb.com.cn/20040109/ly/200312230066.htm>。

³⁶時殷弘，〈國際政治的世紀規律及其對中國的啟示〉，《戰略與管理》1995 年第 5 期（北京：中國戰略與管理協會），頁 1-3。

家採取合作態度；四者認清主客觀的國際局勢且順勢而為；五者確定國家發展目標且量力而為。³⁷

國際社會崇尚實力並以此作為衡量國家強弱興衰之基準，所以新興大國為改變現狀，不免會有挑戰性的作為；在主觀層面上，新興大國若對崛起期望甚高或預設目標以摧毀為主，則多半採取軍事作為；若為爭取平等地位，可能採用和平共處的經濟競賽戰略；尤其是後冷戰時期，全球邁入高科技時代，經濟發展已經取代軍事對抗，相對作為衡量國力的構成的基本要素。³⁸

基於權力政治，致使大國關係及國際體系之變遷，向為世人關注的焦點，冷戰後的中共為遏止國際社會不斷報導的「中國威脅論」，前總理朱鎔基於一九九九年四月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演講時提出：「中國威脅論」應當改為「中國機遇論」。³⁹ 是年十二月更在「新加坡講座」發表〈邁向新世紀的中國與亞洲〉演講中提及，中國應擁抱且抓住機遇以及善於應對挑戰的「機遇與挑戰」之說，如此才可能在風雲變幻、競爭激烈的新世紀中立於不敗之地。⁴⁰ 另可以江澤民所倡議的「居安思危、奮發圖強、抓住機會、加快發展」的外交方向，作為發展「機遇與挑戰」大國外交戰略的新方針。

中共在「十六大」報告中指出，「十五大」以來，中國在對外工作上，廣泛開展雙邊和多邊外交，積極參與國際交流和合作，促使國際地位進一步提高，並開創出一番新局面。所以綜觀全局，二〇二〇年之前是中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在此同時，中共官方喉舌《瞭望》登載〈不容錯失的戰略機遇〉專文中指出：中國大陸現今經由改革開放及經濟建設政策，重新站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起跑線上。⁴¹

冷戰結束後，國際格局中的權力結構劃分發生重大變動，中共利用經濟全球化使國際關係相互依存深化之戰略機遇期，對內積極發展經濟建設，對外加強開放與世界接軌，雙管齊下成為重入國際社會的敲門磚，如此不僅解除「中國威脅論」，並可「抓住機會、加快發展」為「十六大」的總目標「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緊立馬打樁，但在新世紀開始之初，中共評估正面臨「八大重要戰略機遇期

³⁷王在邦，〈世界領導者地位交替與歷史的反思〉，《戰略與管理》第13期，（北京：中國戰略與管理協會，1995年11月），頁2-5。

³⁸閻學通，〈中國崛起的可能選擇〉，《戰略與管理》第13期，（北京：中國戰略與管理協會，1995年11月），頁11。

³⁹〈中國威脅論「消」中國機遇論「長」〉，《新華網》，2003年1月2日。

⁴⁰朱鎔基，〈邁向新世紀的中國與亞洲〉，《大公報》，1999年12月1日，轉引自中國戰略研究（台北），<http://www.future-china.org.tw/fcn/ideas/fci99120103.htm>。

⁴¹〈不容錯失的戰略機遇〉，《瞭望》（北京），2002年11月11日。

」的新一波挑戰，期以經由「韜光隱晦」、「絕不出頭」、「有所作為」三步驟之外交方針，以具實力的大國身分進入國際社會。

三、胡錦濤時期

「崛起」在國際政治理論中意謂：具有一定稟賦的國家在相對力量的迅速增長後，與此力量增長及相應的即是國家之間的關係出現適應性變化。⁴² 美國於廿世紀初期即係因為經濟、科技能力大幅提升，崛起成為世界性大國；再者，國家位處太平洋、大西洋之間的絕佳地緣關係，因而未直接受到兩次世界大戰戰火波及，遂於第二次大戰後以和平方式順利接替英國，成為舉世霸權國家。冷戰後，中共即建構「和平與發展」作為對外關係的理論及時代主題，以創造相對的和平國際環境，並主張國際體系呈現「一超多強」格局，國際形勢長時間內國際力量對比不會發生根本性變化，尤其是全球化和多極化的趨勢，促成大國之間的國家利益及實力相互較勁；顯現「崛起」已正式成為中國的國家基本戰略目標，並以「和平」作為開展國際政治的向度，至於能否爭取到和平的國際環境，執政者的戰略選擇將是關鍵因素。

針對中國大陸經濟蓬勃成長，國家整體綜合國力提升，國際地位的崛起等既定事實之現象，美、日、歐三邊委員會在一九九四年在發表的〈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崛起的中國〉報告中指出，當前的世界正在面對一個迅速崛起的強大中國；二〇〇二年七月，美國國防部發表的《中國軍力年度報告》和美國國會美中安全評估委員會的《美中經濟關係對國家經濟安全的影響》報告，都認為中國的崛起威脅不僅是美國的國家利益，甚至威脅到亞太和世界安全。⁴³ 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時報》撰文指出，不管中國處在什麼社會制度下，西方列強都不能讓中國統一和強大，其旨在維護列強國家的霸權主義地位和既得利益；至於將中國的發展進步予以妖魔化，無非在阻止中國發展，甚至是在達成削弱或分裂中國之目的。⁴⁴ 全球化的來臨，使得中國大陸製造業向有「世界工廠」之稱，現凡工廠物美價廉的輸出，即可造成國際市場的「通縮」現象，對原物料、糧食及礦產的殷求採購，

⁴²張劍荆，〈和平崛起：一個重大的承諾〉，《中國經濟時報》，2003年12月15日，
<http://www.cet.com.cn/20031212/YAOWEN/200312123.htm>。

⁴³陳子明、王軍濤主編，《解除終中國危機》（香港：明鏡出版社，1996年1版），頁202。

⁴⁴〈中國不會威脅和平安全「中國威脅論」可以休矣〉，《多維新聞》，2003年10月15日，
http://www.5.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SinoNews/Mainland/zxs_2003-10-15_357091.html。

即成爲「通膨」；國際社會面對崛起茁壯後的「中國威脅論」時，中國應如何藉「機遇挑戰期」化解危機爲轉機，以「和平崛起」之勢，重新塑造中國對全世界的貢獻。⁴⁵

國際政治體系中，國家崛起的方式與真正崛起相較，後者對世界有更大影響力，而今「和平崛起」似已爲中國主張的長期戰略，爾後在發展速度、方向、意識形態以及改變現狀，致使國際格局及權力平衡必因此而有所影響，甚會引發國際社會的恐懼感、疑慮，猶如十九世紀末的德國和廿世紀初的日本，以驚人的飛躍發跡崛起後，並觸動國際格局中原有大國勢力的介入及抵制。⁴⁶

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爲消弭「中國威脅論」即指示中共中央黨校前副校長鄭必堅，全力建構「和平崛起的中國」理論及籌組理論班子，作爲新的國家發展理論；依據鄭必堅於二〇〇三年十月在博鰲論壇上曾提出三個「重要戰略」，顯已被視爲「和平崛起的中國」理論的基礎，分別爲：堅持經濟和政治改革，爲「和平崛起」提供制度保障；弘揚中華文化，作爲「和平崛起」的精神支柱；統籌各種利益關係，爲「和平崛起」創造社會環境。⁴⁷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十五世紀以來世界主要國家發展史，並請兩位教授分就九個國家近代以後現代化的發展歷程及國家興衰的經驗、教訓進行講解，總結近代以來的霸權興衰歷史經驗和教訓，十一月廿八日龍永圖在武漢大學發表〈加入世貿與中國經濟〉演講中亦提及：中國的崛起將是和平的崛起，而不是所謂的挑戰和威脅。⁴⁸ 中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復於十二月十日在美國哈佛大學發表題〈把目光投向中國〉的演講，首度公開提出中國「和平崛起」的概念，並指出其發展道路的要義在於：中國的發展，不應當也不可能依賴外國，要在擴大對外開放的同時，依靠自身的體制創新，依靠開發越來越大的國內市場，依靠把龐大的居民儲蓄轉化爲投資，依靠國民素質的提高和科技進步來解決資源和環境問題。⁴⁹

⁴⁵石齊平，〈全球化與中國 中國與全球化〉，《商業週刊》第 840 期（台北：商智文化公司，2003 年 12 月 29 日），頁 12。

⁴⁶ 船橋洋一，〈中國和平崛起〉，《朝日新聞（日本）》，轉引自〈日本作家看中國和平崛起〉，華夏經緯網，2003 年 12 月 3 日，<http://www.huaxia.com/zt/2001-23/b/00153003.html>。

⁴⁷ 〈胡錦濤命建構和平崛起論 鄭必堅提三戰略〉，《中國軍事天地》（北京），2003 年 12 月 17 日，<http://www.excitecity.com/china/chat/military>。

⁴⁸ 張劍荊，〈和平崛起：一個重大的承諾〉，《中國經濟時報》（北京），2003 年 12 月 12 日，<http://www.cet.com.cn/20031212/YAOWEN/200312123.htm>。

⁴⁹ 溫家寶，〈提出廣泛文明對話和文化交流〉，《新華網》（北京），2003 年 12 月 11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3-12/11/content_1224824.htm。

胡錦濤更於十二月廿六日利用紀念毛澤東誕辰一一〇周年座談會時，基於國家利益，堅定的表達「三個堅持」，⁵⁰ 並強調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走「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二〇〇四年三月十四日溫家寶再於十屆人大二次會議時的總理中外記者招待會中，將「和平崛起」予以定義為：中國和平崛起，就是要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時機，努力發展和壯大自己；中國的崛起，基點主要放在自己的力量上，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中國的崛起離不開世界；中國的崛起需要很長的時間，恐怕要多少代人的努力奮鬥；中國的崛起不會妨礙任何人，也不會威脅任何人，也不會犧牲任何人。⁵¹

近代以來，新興國家的崛起，無不是建構在戰爭的基礎上，惟有美國雖經一、二次世界大戰的洗禮，但是在崛起的過程完全是以科技、生產力等經濟實力，作為崛起過程中整體國力的後盾，且自一九五〇年代稱霸於世迄今，期間並未出現當年歐洲大國挑戰大英帝國的局面，反出現和平轉移；至於冷戰後，中共不遺餘力的鼓吹今後是以經濟為核心的年代，嗣中國大陸經濟蓬勃發展並提升綜合國力後，但「中國威脅論」即如影隨形，中共改以「戰略機遇期」反駁，再另強調今後的戰略目標是「維護和平、促進發展」、「不稱霸、不擴權」、「共存共榮」，無不是在「和平」的架構下，營造和平環境以從事經濟建設，是以胡錦濤才有「三個堅持」之說，並強調走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走「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

第二節 中共新安全觀與國家利益

國家安全是國家生存的首要之務，而各國在認定國際體系及各國之間的安全環境，以及各國自身對於安全戰略政策及謀略的導向時，常因國際格局的變動影響「安全」觀念、政策及及決策模式。⁵² 當一九四三年美國專欄作家李普曼首次提出「國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 後，學術界即將其與軍事力量之威脅、使用和控制等「軍事安全」概念，幾乎視為同義字。一九七〇年代起以「軍事安全」為核心的安全觀，則被概括為「傳統安全觀」與「非傳統安全觀」兩種類

⁵⁰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堅持堅持走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

⁵¹〈中共中央領導論中國和平崛起〉，《新華網》(北京)，2004年3月26日，
http://news3.xinhuanet.com/zhengfu/2004-03/26/content_1386611.htm。

⁵²同註1，頁388。

型。⁵³ 冷戰期間，「安全」概念受限於國際體制及現實主義學派的影響，使其研究層面著重在軍事議題上，針對各個國家依據國情及國家處境的異同，在「安全」議題上即有不同層次的需求，但多以西方國家的發展歷程作為概念界定的指標；惟在冷戰結束後，國家安全、國家利益、國家生存等問題，不僅呈現多元化的議題發展，且在經濟全球化的推波助瀾下，形成相互依存的現象。

國際社會在無政府狀態下，每一個國家都是主權獨立的政治實體，彼此間在權力平行下的國際政治體系內運作，相互間只有協調而無主從隸屬的關係，針對國家生存和發展之利基，凡所制訂的政策，都必須符合各國的「國家利益」，而「國家生存」是國家最基本的利益，次者是針對國家發展各種需求，而制訂不同的「特定利益」。⁵⁴ 是以本節將探討中共「新安全觀」演變過程，以及從其角度探討冷戰後的中共國家利益。

一、中共新安全觀形成因素

「安全」概念依據各個國家的國情，呈現出不同的認知，中共建構「新安全觀」，不僅呼應冷戰結束的時代轉變，亦是受到西方國家對於「安全觀」有不同的主題訴求所致。⁵⁵ 惟在傳統「安全觀」轉型至非傳統是「新型態安全觀」過程中，中共「新安全觀」並非惟一的類型，期間尚有美國、歐洲、亞洲等國家，根據國家狀況有不同的目標及訴求重點。現僅就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觀之綜合性安全簡析如下，另兩者之簡易區別概述如附表（表：2-2）。

表 2-1：傳統安全與綜合性安全比較表

	傳統安全	綜合性安全
行為主體	國家	個人、次國家團體、國家、國際機構
界定取向	獨重高階政治	低階政治為要、高階政治仍重
分析層次	體系、國家	個人、次國家團體、國家、區域、全球

⁵³ 名詞解釋，中共中央組織部，《黨建研究》（北京），<http://www.zgdjyj.com/xxzl/view.asp?id=481>。

⁵⁴ 孔令晟，《大戰略通論：理論體系和實際作為》（台北：好聯出版社，民國 84 年版），頁 7 至 8、141 至 142。

⁵⁵ 魯維廉，《中共「新安全觀」與「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民 90 年），頁 9。

分析面向	戰略、軍事	經濟、政治、軍事、社會、環保
威脅來源	外來侵略	內發性與外在威脅並重
保衛目的	領土、主權	重大利益、核心價值免於受到侵害

資料來源：劉復國，〈綜合性安全與國家安全：亞太安全概念適用性之檢討〉，《問題與研究》（台北：政大國關中心，民國 88 年 2 月），頁 26。

（一）傳統安全觀與非傳統的新型態安全觀

傳統現實主義者在研究安全觀時，多主張國際體系在無政府狀態下，國家是行為主體亦為既定的外部形式，強調以「權力」分配為架構基準，據以決定「國家利益」之行為，並採取「權力平衡」形式運作；至於「安全」係對國家、政府、領土等指涉對象造成「存在性威脅」(Existential Threat) 而面對的生存問題。新現實主義者主張國際體系在無政府狀態的結構運作下，國家行為體所關心的是安全而非權力，惟透過合作政策才可以降低「安全困境」。傳統安全觀係以制約對手為出發點及基礎，但一九八〇年代起，國際體系雖仍呈現美、蘇兩大集團的軍事對峙狀態，但國際社會在經濟領域層面，德、日以經濟大國姿態崛起，形成國與國之間在具有共同利益時，即以合作方式解決，進而形成另類型式的安全觀念。後冷戰時期的國際體系明顯呈現出地區化趨勢，而主要大國卻在工業、軍事及政治能力向外擴散後，導致對全球性的影響力受到侵蝕。傳統安全觀的理論和實踐，主要焦點是圍繞在國家之國家地位面對外部威脅時，並透過「安全化」(Securitization) 以建構軍事力量，但國與國之間的軍事互動，卻陷入軍備競賽、軍事技術擴散等「安全困境」。⁵⁶

冷戰期間的兩極對峙現象，安全的主要觀念係以「軍事安全」為核心價值，而基本特徵則以軍事聯盟為基礎，企圖通過軍事集團的形式，藉由武力手段解決國與國之間的分歧與爭端，最終以達到稱霸世界之目的。所以中共方面主張「傳統安全觀」無助於保障國際安全，更不能營造世界的永久和平，但此安全思想概念仍具支配性的主導位。⁵⁷ 傳統安全觀係以政治及軍事安全為中心，主政者必

⁵⁶朱寧譯，Barry Buzan、Ole Waever、Jaap De Wilede 著，譯者序，《新安全論》(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頁 12、21-22、29、67-73。

⁵⁷高強，〈樹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協作的新安全觀〉，《求是》雜誌第 12 期(總 361 期)(北京：中共中央委員會)，2003 年 6 月 16 日，
<http://www.qsjournal.com.cn/qs/20030616/GB/qs%5E361%5E0%5E13.htm>。

須確保國家不受外力侵略，並須制訂前瞻性（forward）戰略，以制衡具有敵意的行為者，是以軍事安全常等同視為國家安全。⁵⁸

冷戰後國際體系呈現和平局面，軍事安全似乎頓然消失一般，但在區域大國間權力消長同時，使得「一超多強」（或「單極多元體系」）的國際格局隱然成型，另因蘇聯集團瓦解後，核生化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基於國家安全，悄然形成另類的「安全困境」、軍備競賽；再者，全球化趨勢使得跨國性的環境、經濟、社會、文化等安全威脅問題，引發另類性質的安全問題。

冷戰後經濟發展儼然成為國家利益的核心目標，國際環境因國與國之間的合作與相互依存關係，而呈現出和平態勢，以致向來強調軍事力量強弱，影響國家安全與威脅的傳統安全觀，因經濟、社會、環境、文化及區域聯動等問題，使得安全觀念有所變革並應運而生有別於傳統的安全觀，新型態的安全觀計有：

第一、美國的合作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

此係因冷戰後的國際社會交流頻繁且為相互依存關係，面對大量毀滅性武器擴散的威脅問題，無一國家可以倖免於難及獨立解決此安全問題，為化解「安全困境」及各種緊張情勢，強調以「預防外交」（preventive diplomacy）防範於未然，並倡議在相互合作交往的基礎上，以建設性和開放的方式，建立國際社會間「合作安全」模式，藉以建構國際安全以因應對各種安全性的挑戰。⁵⁹

第二、歐洲的共同安全（common security）：

歐洲國家基於組建歐盟之故，對於安全觀的議題不同於美國的「合作安全」觀，強調所有國家對於安全問題都有合法的權利，而是國家之間相互性的作為，此種「共同安全」倡導軍備裁減、建立互信機制，成員共同參與國際安全決策，以益於維護國際安全。⁶⁰

第三、亞太地區的綜合性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

亞太地區國家強調安全的多樣化內容與多重型態，除軍事安全外，還應包括許多非軍事安全，國家安全尚須關注國家不同發展的階段與需求，因此

⁵⁸李明，〈中共國家安全設想及其對發展中國加外交〉，「國家安全之在思考」學術研討會（台北：政治大學外交系，民國93年6月25日），頁6。

⁵⁹朱蓓蓓，〈全球化與中共安全觀：轉變與挑戰〉，《中國大陸研究》第46卷第6期（台北：政大國關中心，民國92年11/12月），頁85-86。

⁶⁰鄭端耀，〈新型安全觀與兩岸關係〉（台北：政大國關中心）

<http://iir.nccu.edu.tw/newact/%E6%96%B0%E5%9E%8B%E5%AE%89%E5%85%A8%E8%A7%80.htm>

安全已非一國之力可以應對，而應透過國際共同合作方式為之。對於「安全」則強調綜合性、相互依存、合作和平安全與共同安全、自立更生、包容性、和平接觸及好公民等七大原則之下，建立信任措施、預防性外交、和平解決衝突等內容，尤其是軍事力量應保持防衛性和非威脅性。⁶¹ 有關亞太地區各國重要主張簡述如下：

1、日本模式：

一九八〇年七月之際，日本首相鈴木善信在〈國家綜合安全報告〉中，列舉「綜合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的六大目標：加強與美國軍事合作；提高保衛日本領土的能力；改善同中國與蘇聯的關係；保障能源安全；保障糧食安全；應付重大地震。⁶² 凸顯軍事安全以外，經濟安全亦有其重要性。

2、東盟模式：鑑於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非軍事領域的安全問題，對「東盟」各國益顯重要，遂倡議全方位、多因素以整體安全保障為基礎之「綜合安全觀」，並以「國家抗禦力」和「地區抗禦力」為此新安全思想的核心概念，其主要內容為：安全要素從軍事轉向經濟；安全重心從內部轉向外部；安全範圍從一國轉向地區。⁶³

3、新加坡模式：新加坡強調藉統一的民族認同和持續的經濟發展，以保證國家的穩定發展，遂主張由心裡、社會、經濟、民防、軍事等防禦範疇之「總體防禦」觀念，以實現國家的「總體安全」。⁶⁴

經濟全球化後促使國家利益及國力強弱，係以經濟發展為著眼，但在安全概念為有別於傳統安全觀，美、歐、日及東盟各國基於國家利益及國家安全現狀，分別提出非傳統的新型安全觀，概念由由個人逐步擴大至國際體系，涵蓋的安全層面則反向運作至個人，形成各領域多元層次的安全觀，至於傳統的軍事安全僅是手段而已，綜上新型安全觀所強調的是「相互依存」關係。

⁶¹外交篇，〈中共倡議新國際關係安全觀〉，《2002 中共年報》（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2000 年版），頁 5-6。

⁶²王逸舟，《全球政治與中國外交－探尋新的視角與解釋》（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 年 12 月版），頁 1。

⁶³陸建人，〈東盟的新安全觀〉，《當代亞太》總第 57 期（北京：中國社科院亞太研究所，1999 年第 8 卷第 9 期），http://www.cass.net.cn/y_qkzz/qkzz_07gj/qkzz_07_11_09.htm。

⁶⁴同註 61。

（二）中共新安全觀形成及構成因素

後冷戰時期，亞太各國為追求國際體系之權力平衡，競相凸顯所在國為區域的安全中心，以致出現美國、中共與印度將戰略重心「東移」，日本將戰略重心「南移」之現象。中共基於國家利益及安全考量，遂於一九九〇年代起，即與俄羅斯、中亞及越南、寮國等陸地接壤的鄰國完成勘劃國界，並簽訂邊界條約或協定，紓解長期以來面臨的鄰邦安全威脅；相對為保護沿海經濟開放地區，國防政策由「近岸防禦」改為「近海防禦」，惟此戰略重心東移，竟與美國、日本形成戰略對峙現象。⁶⁵

中共為與「綜合安全」觀念與時俱進，即於一九九五年在〈中國的軍備控制與裁軍〉報告中提出：在新的國際形勢下，「軍控與裁軍」作為國家安全政策的組成部分和減少戰爭危險的有效措施之一；「十五大」政治報告中提及，經濟和科技的發展與進步是國家安全的根本保障，裁軍五〇萬即是對國際潮流和中國國情的深刻認識，不僅有利於創造國際和平環境，亦是軍隊積極支持國家經濟建設的具體行動。一九九八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中「國際安全形勢」篇指出：和平、合作、發展已經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軍事安全不變外，經濟及政治性安全日益重要，亞太各國經濟相互依存加深，安全應當依靠相互之間的信任和共同利益的聯繫。顯現中共對於「安全」的概念已顧及國際潮流趨勢及亞太地區的特性。

一九九六年四月中共利用創立「上海五國」機制時，初步提出「新安全觀」構想，一九九七年四月在中俄〈關於世界多極化和建立國際新秩序聯合聲明〉首次闡述「新安全觀」的基本內容，直至一九九九年三月廿七日江澤民在日內瓦裁軍談判會議上發表〈推動裁軍進程，維護國際安全〉講話時述及，「新安全觀」的核心價值在於「互信、互利、平等、合作」，進而依此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如此才能保障國際安全及營造世界和平。⁶⁶ 此後江澤民、朱鎔基、胡錦濤、錢其琛等中共國家領導人，即利用聯合國千禧年高峰會、中共成立八十週年大會「七一講話」、東盟與中日韓（10+3）等各種不同的國內、國際雙邊或多邊等公開場合大肆宣揚「新安全觀」。

中共官方正式有系統地闡述「新安全觀」政策主張，係於二〇〇二年七月卅

⁶⁵董立文，〈兩岸關係與東亞安全前景〉（台北：中華歐亞基金會），
<http://www.eurasian.org.tw/discussion/discussion003/p5.htm>。

⁶⁶同註 61。

一日在東盟地區論壇外長會議期間，提交具體立場並予全面系統地闡述國際體系新形勢下的安全觀念和政策主張；筆者予以整理區分為宗旨、目標、核心政策價值觀及實踐成效。⁶⁷ 詳如附表（表：2-3）

表 2-2：中共關於新安全觀的立場

	要 義	基 本 特 徵
宗 旨	對話與合作	國際關係緩和、世界經濟發展為國際形勢
目 標	共同安全	安全威脅多元化及全球化趨勢
	共同利益	各國安全共同利益增多，相互依存加深
原 則 及 基 礎	開展合作	遵守《聯合國憲章》、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及國際關係準則
	談 判	和平解決領土、邊界爭端和其他有爭議的問題
	互惠互利 共同發展	改革和完善現有國際經濟與金融組織，尋求共同繁榮
	傳統及 非傳統安全	防止外敵入侵、維護領土主權完整； 關注，重點對打擊恐怖主義、跨國犯罪等領域。
	公正、全面 合理、均衡	實行有效的裁軍和軍控，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維護國際軍控與裁軍體系，不搞軍備競賽。
核 心 政 策 價 值	互 信	摒棄冷戰思維和強權政治心態，不猜疑、不敵視。各國應就各自安全防務政策及重大行動展開對話與相互通報。
	互 利	順應全球化時代社會發展，尊重對方安全利益，實現自身安全利益，創造實現共同安全。
	平 等	國家無論大小強弱，應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不干涉別國內政，推動國際關係民主化。

⁶⁷ <中共向東盟地區論壇提交新安全觀立場文件>，中共外交部網頁，2002年8月1日，
<http://www.fmprc.gov.cn/chn/wjz/zjz/gjs/gjzzyhy/1140/1141/t4693.htm>。

觀	協 作	以和平談判解決爭端，就共同安全問題廣泛深入合作，防止戰爭和衝突。
實 踐	上海合作組織	倡導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安全合作模式。
成 效	東盟地區論壇	開展建立信任措施、推動預防外交方； 通過平等對話促進新安全觀的主張； 開展實質性探討與合作，促進互信合作。

資料來源：中共外交部網頁；

<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gjs/gjzzyhy/1140/1141/t4693.htm>。

中共國防部長曹剛川在二〇〇四年四月初在泰國國防研究院演講時表示，中共倡導「新安全觀」，係在強調共同安全、綜合安全、合作安全，以擁有利於和平、穩定與發展的國際和地區環境；⁶⁸ 但據印度近期公布的國家安全評估報告指出，目前國家安全指數的排名依次為美國、中國、日本、韓國、瑞典、俄羅斯、德國、印度、法國、英國和以色列；另常規部隊指數排名順序為美國、中國、俄羅斯、印度、朝鮮、巴基斯坦、土耳其、伊朗、日本、法國；國防開支指數排名美國、俄羅斯、中國、日本、英國、法國、德國、沙烏地和意大利。⁶⁹

中共倡議的「新安全觀」，其實仍在延續「獨立自主」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政策，圍繞在「和平」的基礎架構下，並先從核心的睦鄰友好合作開始，再輔以「不對抗、不結盟、不針對第三者」之方針，進而促使國際體系內各國在多元化的「安全」，藉由「相互依存」促成國際關係民主化，無非是企圖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構築夥伴關係以達到反霸、反強權政治之目的，但在中共在軍事武裝力量及國防經費上，並未降低比例，對於整體得國際政治局勢及亞太安全，又隱藏有威脅的危機。

⁶⁸ <曹剛川：中國倡導「新安全觀」>，亞洲新聞網，2004年4月1日，
<http://www.cna.tv/stories/china/view/16978/1/gb.html>。

⁶⁹ <中國安全指數世界第2—印度評估報告>，亞洲新聞網，2004年4月2日，
<http://www.cna.tv/stories/china/view/17024/1/gb.html>。

二、中共國家利益的效益與期程

國際社會中沒有永恆的朋友，只有永久利益，國家為求「自保」遂制訂「戰略」，其宗旨無非是在謀求「國家生存」與「國家安全」；⁷⁰ 所謂「國家戰略」的意涵，係各國以「國家利益」為基礎，綜合運用所能掌控的各種政治、經濟、軍事、心理等構成國力之因素，藉以發展國家潛力（potential）並轉化為國家實力（force），再透過各種造勢活動以營造有利於己的時空與國際環境，俾達成國家預期的目標。⁷¹ 近代以來的國家為求強盛，皆採行先富國後再強兵之作為；是以在後冷戰時期的經濟利益已逐漸取代安全利益，以致於「對外開放」是維護國家利益的根本需要。⁷²

鄧小平在一九九二年南巡時提出「三個有利於」以積極從事改革開放，「十二大」起提出改革開放的經濟發展戰略部署，「十三大」定調為「三步走戰略」⁷³ 且為黨政部門及全國人民奮鬥的總目標，「十四大」將「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正式列入黨章並作為今後國家現代化發展的主要建設目標。⁷⁴ 針對鄧小平倡議：「中國雖是政治大國，但在經濟上卻是小國」，主張以「三步走戰略」先期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再塑造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最終在實現建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所以大多數國家在制訂國家戰略時，所考慮者均僅是國家利益而已。⁷⁵ 至於在遂行國家利益的政策層面上，則可藉由不同的訴求及主張予以施展，如在「十五大」期間倡議「三個代表」，以強調黨、國家及人民的根本利益；再依其定位終結顯示，「富國強兵」乃是中共當前國家發展的首要之務。⁷⁶ 「十六大」政治報告中指出，力主在「三個堅持」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進程中，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各種具體的利益關係和內部矛盾可以在此基礎上調節。

利益是判斷指導政治行為的惟一永存標準，「國家利益」被普遍視為國家的

⁷⁰ 鈕先鐘，《戰略思想與歷史教訓》（台北：軍事譯粹社，民國 68 年版），頁 43-45、65。

⁷¹ 同前註，頁 80-84。

⁷² 同註 23，頁 123-130。

⁷³ 解決人民人民的溫飽，進階至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直至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實現基本現代化；〈三步走戰略〉，新華社網路中心（北京），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2/content_702946.htm。

⁷⁴ 《鄧小平文選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頁 248；四項基本原則，中國共產黨（北京），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7/content_709114.htm。

⁷⁵ 同註 70，頁 311。

⁷⁶ 于友慧，〈中共外交政策走向與選擇〉，《問題與研究》第 43 卷第 1 期（台北：政大國關中心，民國 93 年 1、2 月），頁 108。

對外關係的基本準則，至於國家當局所制訂的國際戰略，即攸關對外關係的國家整體利益；有學者主張國家利益涵蓋變與不變兩種因素，變者係在因應國際和國內形勢變化，區分為生存、重要、主要、次要四種類型；不變者為基本利益，包括為國防、貿易、世界秩序、意識型態的維護和宣傳。⁷⁷ 依據國際環境變化、國家實力、科技水平、國家的各種不同時期的處境及主觀認識，導致各國的國家利益不盡相同，但是國家利益的基本層次，依序為民族生存、政治承認、經濟利益、主導地位、世界貢獻；另國家利益之效益，有國家生存等不變的長久利益，以及依國家政策需要的長中短期利益。⁷⁸

鑒於中共官方迄今並未明確指出國家利益所在，故筆者嘗試從〈二〇〇二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中引述的「國家利益」，⁷⁹ 依據政策角度探索中共的「國家利益」所涵蓋的層面：

（一）長久利益以經濟發展政策為核心

馬克思主義者主張，國家是階級社會的政權組織，任何國家都要為爭取和維護國家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條件而鬥爭；值此之故，國家利益不僅代表統治階級的利益，且代表全民族或權社會的共同利益。鑒於「國家利益」係以客觀物質為基礎，但在認知和判斷方面卻是主觀，可因應環境變化而進行調整；⁸⁰ 顯示中共「國家利益」所指的一切，無非在滿足國家全體人民物質與精神所需要，至於物質層面即為國家安全與發展，精神層面則為被國際社會尊重與承認。

一九八〇年代起，中共倡議「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經濟建設政策，迄今更以「三步走戰略」建立全面小康社會作為國家利益的核心政策，衍生對外關係則是強調創造和平的國際環境，「十六大」起更以「和平崛起」作為遂行的主軸。基此，中共國家利益首要即為「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維護主權、統一、領土完整和安全」，顯然與「三步走戰略」互為中共「國家利益」的政策核心及策略目標。

⁷⁷同註 1，頁 85-91。

⁷⁸閻學通，《中國國家利益分析》（河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年 8 月 2 版），頁 45-54、67、24-25。

⁷⁹維護主權、統一、領土完整和安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提高綜合國力；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持和促進社會的安定團結；爭取一個長期和平的國際環境和良好的週邊環境。

⁸⁰同註 3，頁 144-146。

(二) 長期利益在國富後的強兵

中共一向主張「國家利益」涉及內政穩定及對外策略，甚至國際政治體系間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以及捍衛國家領土及主權的堅定立場。惟政治、經濟、軍事、安全、文化等各種層面的國家利益，常依國內政情及國際環境變化而有所改變。⁸¹ 但中共在主張國家利益時，從事現代化建設其本質即是全體人民的共同利益；至於人民生活水平好轉、國家興旺發達、國家信譽隆起後，衍生其義即為國家興衰起蔽。

冷戰後全球化的趨勢，經濟發展促使國際社會中的各國之間，因經貿往來而形成「相互依存」關係；惟在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時，鄧小平即指出國家利益是為最高準則。⁸² 基此，國家利益的長期目標在期使中國大陸進入小康社會，不僅是國家經濟實力竄升，更意謂進入基本現代化程度，相對地綜合國力增強，國際地位提高，屆時「中國」即可建成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屆時必會重新調整國家利益，進而對國際體系的政治經濟新秩序產生影響。

(三) 中期利益在遂行開放與接軌政策

一九八〇代起，中共對外實施「開放」政策且積極從事經濟發展，並以「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中國」作為全民「國家利益」的主體意識；對此，美國國務院前官員馬紹爾（C. B. Marshall）在《國家利益及當前的世界問題》中具體指出，「國家利益」是政府與人民的相互認識、期望、信念、立場及目標，並與國家的生存、安全、發展及福利有密切關係。⁸³

中共向來主張外交是內政的延長，而國家政治目的即在取決於對所希望的和所涉及的各项價值相互間的大致平衡，⁸⁴ 惟在「國家利益」的運作層面，為期在國內外有足夠威望、對外具有擴張能力，遂在一九九〇年中期為凸顯經濟大國的成就，即藉舉辦各種區域性、世界性大型學術、藝術及體育活動，以務實態度，建立國家整體上下交相流且以「國家利益」為核心的外交政策。

⁸¹李登科等著，《國際政治》（台北：國立空中大學，民國85年初版），頁75-78。

⁸²同註12，頁330。

⁸³李其泰，《國際政治》（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民國52年初版），頁103。

⁸⁴時殷弘，《國際政治—理論探究、歷史概論、戰略思考》（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頁581-582。

中共為求在經濟上自給自足，以期國家能自我保存，在國家利益策略上，主張不斷提高綜合國力；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保持和促進社會的安定團結。自鄧小平以降的領導人，即提出「三個有利於」、「三個代表」、「三個堅持」等政策，作為推展國家利益之政策指南，以結合國家所有資源，形成利益—目標—政策—力量—利益之施政的循環式策略鍊。

（四）短期利益在建構外交和平共處環境

各國基於國情建構符合自身國家的國家利益，但在國際社會的互動體系中，國與國之間仍存在著共同（*identical*）、互補（*complementary*）及衝突（*conflicting*）等國際利益（*international interest*），由於冷戰後的國際環境時空背景變遷，導致各國對於國際利益，呈現環環相扣或是相互矛盾之情形。惟各國在追求國家利益時，較期望以和平方式解決，並多採用聯盟或外交協商或多邊主義達成。⁸⁵

成功的外交政策運作，不僅可扭轉外交局勢更可提升國家整體利益，十九世紀末德國首相俾斯麥成功運用權力平衡外交，使德國成為歐洲強國；惟今中共在對外關係上，倡議建構新安全觀，強調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以提供中國大陸經濟建設的外部條件，更藉由新型態結盟之夥伴關係，積極從事經濟發展，俾蓄積國力，以利和平崛起。

第三節 夥伴關係與大國外交

沃爾弗斯（Arnald Wolfers）在《衝突與合作》（*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指出，現實主義的重要原則即為「國家利益」與國家的直接目標的結合。⁸⁶ 鑒於國際社會強調權力政治的大國主義，而各國為因應瞬息萬變的國際情勢時，即在基於「國家利益」的衡量下，制訂相關政策作為對外關係的準繩，以維護「國家安全」及維持「國家生存」，是以國際政治中常藉由「聯盟」方式，以建構或組合等手段改變國際格局力量，因而形成「安全困境」，並引發國際社會的緊張局勢；是故中共為能在國際社會中「和平崛起」，特別重視如何建構造和平的國際

⁸⁵同註 81，頁 77-78。

⁸⁶倪世雄等著，《當代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上海：復旦大學，2002 年版），頁 3。

環境，所以在冷戰後倡議「新安全觀」，並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下，建立「不對抗、不結盟、不針對第三者」的夥伴關係。本節試圖探討中共在遂行「大國外交」與建立「夥伴關係」之間的相互因果關係。

一、中共建立的大國夥伴關係類型與比較

鑒於時空環境變遷及附加的目標行為主體不盡相同，以致「國家利益」在「生存自保」的先決條件下，必將隨時代潮流趨勢可賦予不同的內涵。學者謝布瑞（Paul Seabury）指出，「國家利益」的概念，可視為國家在處理對外關係時，亟欲追尋可實現、可描述的理想目標。⁸⁷ 前蘇聯學者帕茲涅雅可夫則認為，「國家利益」可作為對外政治活動的推動力，至於「利益」不僅具有真理性，連帶在虛假的情況下，仍可引為對外政治活動的動力；故常謂「對外政策利益」即是「國家利益」。⁸⁸

冷戰期間，中共的外交政策深受十九世紀中國對外關係的影響，首先是國際地位，建立在「半殖民地理論」及「中間地帶理論」；再者，外交政策仍深受美、蘇兩強權的影響，雖然中共僅是區域強權，但在國際事務處理上，不僅主張以世界革命挑戰國際秩序，更是影響美、蘇強權戰略平衡及抵擋美蘇侵略的惟一國家，所以季廷（John Gittings）形容中共為「準強權」，冷戰後期則成為「三強鼎力」局面。⁸⁹ 巴瑞·布贊（Barry Buzan）指出：一九八〇至一九九〇年代期間，國際體系中出現成熟的無政府狀態，「成熟」國家體認到基於「安全」因素，在制訂政策時，應該考慮鄰國的利益。⁹⁰ 冷戰後的國際關係強調相互依存的合作安全關係，所以國與國之間的合作不僅是雙邊或睦鄰關係的合作，在面對瞬息萬變的國際局勢時，合作不免受到國際社會及環境的影響，涉及層面不僅有國家的利益，還包括其他方面利益，所以國際體系中行為者不管能否接受，都要面對的競爭與角逐。⁹¹

⁸⁷李偉成、譚溯澄譯，K. J. Holsti 著，《國際政治分析架構》（*International Policy,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台北：幼獅文化公司，民國 85 年版），頁 169、170。

⁸⁸洪兵，《國家利益論》（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1 年版），頁 78、79。

⁸⁹何宏儒譯，John W. Mason 著，《冷戰》（*The Cold War: 1945-1991*）（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1 年版），頁 103-105、115。

⁹⁰朱寧譯，Barry Buzan、Ole Waever、Jaap De Wilede 著，譯者序，《新安全論》（*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頁 5-6。

⁹¹孫壯志，〈淺析 21 世紀中亞地區的安全格局〉，《東歐中亞研究》第 3 期（北京：，2002 年），http://www.cass.net.cn/chinese/s24_oy/Magazine/Yanjiu/0203/020312.htm#_ftn1。

中共不斷強調「和平與發展」是後冷戰的時代主題，各國經濟相互依存加深，全球和區域經濟合作組織的作用加強，發展經濟和科技，增強綜合國力，是各國的主要戰略趨向。大國之間既相互借重、合作，又相互制約、競爭。⁹² 現階段「新安全觀」幾已成爲中共對外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新的國際新秩序尚未建立，卻觸動大國之間爲因應新的國際關係，尤其就雙邊發展關係而論，尋求協調合作避免發生對抗，仍居主導地位，所以各國紛紛調整戰略定位，彼此間在既有的國際體系結構之中，建構「夥伴關係」，藉以形成非對抗性、合作及穩定之關係。⁹³

中國大陸的經濟繁榮發展後，大多數亞洲國家實際上對高速發展的中國都享有貿易順差，進而喚醒東亞地區喚命運共同體的感覺。⁹⁴ 再者中共的常備武器軍事實力、核武實力及位居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政治實力，使得中共的國家實力及競爭力在冷戰後產生變化，連帶「中國」的國際地位由一般大國晉升爲具主導地位的區域性大國。中共外交部長唐家璇指出：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新時期中國外交戰略和政策是承襲毛澤東、周恩來外交思想和發展，並由「堅持獨立自主」、「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三大支柱所構成；冷戰後則堅持鄧小平外交思想及戰略觀，開創中國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尤其在致力於與美、俄、日、英、法及加拿大等發達國家構築新型關係的框架上，建構各種夥伴關係。⁹⁵

國際格局中的大國地位無非係以實力及競爭力的變化，作爲建構大國關係的基礎，然再以各國的國家利益作爲的原則，並在共同利益或衝突利益的考量下，呈現全球性及區域性之對外關係。世界主要大國、國家集團及區域間各國相互之間，基於各種政治性、軍事性、經濟性的議題，紛紛建立各種不同形式的夥伴關係，以確保全球性或地區性安全，如北約各國（含俄羅斯）的「和平夥伴關係計劃」、德俄的「特殊夥伴關係」、日俄的「建設性夥伴關係」及美日的「安保條約」、「面向廿一世紀的亞歐新型夥伴關係」⁹⁶、「歐盟與中東地區建立戰略夥伴關

⁹² <中共 2002 年國防報告白皮書>（安全形勢），人民網（北京），<http://www.people.com.cn>。

⁹³ 張蘊嶺主編，《伙伴還是對手－調整中的中美日俄關係上篇、中篇導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年版），頁 5-6、78。

⁹⁴ <外報評論：中國崛起在改變全球經濟政治秩序>，新華網，2003 年 1 月 2 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xinhuanet.com/home.htm>。

⁹⁵ 唐家璇，〈新中國外交五十年〉，《黨建研究》（北京），1999 年 10 月，<http://www.zgdjyj.com/magz/viewmagz.asp?id=1450>。

⁹⁶ <亞歐會議>，新華網，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misc/2002-09/13/content_560848.htm。

係」；⁹⁷ 以及「東盟與日本全面經濟夥伴關係」、「日本和新加坡新時代經濟夥伴關係」。⁹⁸

「夥伴關係」係各大國在後冷戰時面對非傳統安全觀時，以政治、軍事手段為後盾，以經濟、科技合作為重點、以解決社會、環境問題為基礎，並在相互依存國際社會中，透過雙邊或多邊的協調機制，建構權力平衡的國際格局。大陸學者表示，中共的「大國外交」不足以解決中國所有的國家利益問題，終其只是在為「四化」服務而已，至於「夥伴關係」頗似李鴻章「以夷制夷」的謀略，面對美國的超強地位，端視中共所建構的夥伴關係中，僅有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是為較成功的模式。⁹⁹ 另其他「夥伴關係」或表述為後冷戰時代中共與其他主要大國相互依存增加情形下，與傳統大國結盟對抗的新型國際關係。¹⁰⁰ 中共外長李肇星 2004 年 4 月在亞歐外長會議時指出：多邊主義是解決國際爭端的重要手段，並以作為建構全球夥伴關係的基礎，尤其在建立夥伴關係時，各國在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上應一律平等；維繫夥伴關係時，應透過對話實現互信，以和平解決爭端；鞏固夥伴關係應以互利和作為動力。

「九一一事件」後，國際社會進入到後冷戰時代，國際間「安全」議題呈現多樣性，「安全合作」不僅是指發展模式和觀點一致國家之間的合作，亦包括發展模式和觀點不一致國家之間的合作。所以「夥伴關係」反映出各國涉處在多極化的國際體系，面對全球性、區域性、地方性的議題不同，在解決政治、軍事、社會、環境及經濟等綜合性各種安全問題時，出現既是競爭者又是合作者的局面。大國制宰國際體系及國際秩序，是以筆者嘗試以「新安全觀」的核心政策價值，依據夥伴關係的親疏分將中共與各國建立的夥伴關係，區分成以下型態詳如附表 2-5。

⁹⁷ < 歐盟要與中東建戰略夥伴關係以維持該地區穩定 >，新華網，2004 年 3 月 27 日。

⁹⁸ < 亞太地區各大國博弈東盟 成爲全球經濟新熱點 >，中國雲南電視台，2003 年 10 月 20 日，<http://www.yntv.com.cn/web/dongmeng/zixun/2003-10/1066641069.html>。

⁹⁹ 張登及，< 冷戰後中共「大國外交」之研究：理論與實踐 >（台北：政大東亞所），頁 388-389。

¹⁰⁰ 朱馬杰，< 世界格局多極化趨勢中的文化因素 >，《中國評論》，2000 年 8 月 8 月號，頁 65；轉引自張登及，《中國大國外交研究》（博士論文），頁 99。

表 2-3：中共建構的夥伴關係類型表

類 型	目 標	架 構	夥伴類型	國家代表
平等型	權力平衡—基 準	獨立自主	全面性	歐 盟
協作型	國家安全—核 心	共同安全	戰略協作性	俄羅斯
互利型	國家利益—目 標	共同利益	建設性	美 國
互信型	相互依存—依 據	對話合作	合作性	日 本

資料來源：筆者自繪

二、推行大國外交之原則

「外交」不僅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對話」，更加注重「妥協」(compromise)之基本精神，所以制訂外交政策時，常因涉及國家傳統的歷史淵源、地理環境及國家利益等因素，而影響外交政策路線。¹⁰¹ 現代戰略學家薄富爾(Andre Beaufre)倡議未雨綢繆的「明日戰略」(Strategy for Tomorrow)，即在防範陷入「今日之友成爲明日敵人」的困境。值此，外交工作應採取因地、因時制宜之靈活運用原則，始能適應瞬息萬變的國際環境。尤在冷戰後的國際體系面臨轉型之際，各國外交政策爲因應國際格局，而呈現出力量轉移和分散之狀況，是故中共的國家利益概以對外關係作爲出發點。¹⁰² 殷鑑國際社會中之「大國」者，都有各自獨特性的實力，進而影響全球性或區域性國際事務的運作及處理方式，針對實力特性可區分爲政治性、軍事性、經濟性，依據影響力可區分爲地區性、世界性、超級大國。¹⁰³

中國在面對冷戰後的國際體系時，係以「國家利益」爲戰略核心，將國家戰略定位於「世界性大國」層次，並將戰略目標計畫在廿一世紀成爲亞洲政治經濟大國，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在國家戰略部署作爲上，經濟外交較政治及安全外交爲優先，藉此與世界融合接軌。針對鄧小平國際政治思想主張的「韜光養

¹⁰¹ Adam Watson, 《Diplomacy: The Dialogue Between States》(Mc-Grow Hill, 1983), p31；轉引自萬仞，〈戰略與外交〉，《國防雜誌》第 14 卷第 3 期(台北，民國 87 年 9 月 16 日)，頁 16-18。

¹⁰² 阿爾溫·托夫勒，《權力轉移》(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頁 30、361-362；轉引自俞正梁等著，《大國戰略研究：未來世界的美日歐(盟)和中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年版)，頁 317、349。

¹⁰³ 余起芬，《國際戰略論》(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 年版)，頁 233。

晦」並非消極防守，「有所作為」亦非盲動蠻幹，「絕不出頭」本非一蹴可幾；¹⁰⁴ 鑒於現實的外交政策不僅要慮及自身國家利益，而且亦要尊重其他國家的利益，所以可透過經濟接觸為政治親睦提供物質基礎，進而開拓共同利益且有助雙方政治的往來。

中共遂行「大國外交」在國際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筆者將依據鄧小平之外交方針：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絕不出頭，作為檢證模式並進行進一步探討且簡析如下：

（一）韜光養晦在參與且融入國際體系

一國處理國際事務的指導原則，或是為達成國家利益所執行的手段與策略，或旨在影響其他國際行為者的行動，皆可謂為外交政策；現實主義學者指出，外交政策之目的在擴大國家利益，首要在生存，所為無非是在適應詭變多局的國際政治而已。¹⁰⁵ 針對國際政治運作可經由觀察各國對權力外交的遂行情形，而瞭解幕後真正的企圖心所在；舉凡欲保持權力不變者，係在維持權力現狀；欲改變現存的權力關係者旨在表現；另或是增加權力者係在執行威望政策。¹⁰⁶ 華爾滋另指出，國際政治結構中的主角，永遠是擁有實力的國家，國際政治結構只關切國家的相對地位和權力分配狀況而已。¹⁰⁷ 中共在後冷戰及後後冷戰時代的歷史機遇與挑戰時期，在對外政策上不僅面臨挑戰，而且必須進行根本性的重新選擇；但殷鑑德國與日本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無非意圖在建立國際體系的新秩序，惟在挑戰失敗後，透過融入「雅爾達體系」的運作，進而成為世界性的經濟大國，然在經濟實力成長後又觸動綜合國力增長，卻不能依此轉化為對國際體系影響力；經此透過鄧小平主張的「務實外交」及「全方位外交」策略可知，若國家的經濟發展無法利用世界市場和國際分工，即無法對中國大陸經濟進行深化改革與發展，以符合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終極國家利益。

¹⁰⁴楊錚，〈世界政治近程的週期性規律與中國的機遇〉，《戰略與管理》第 13 期（北京：中國戰略與管理協會，1995 年 11 月），頁 6-10。

¹⁰⁵同註 81，頁 90-91。

¹⁰⁶張自學譯，Hans J. Morgenthau 著，《國際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 Fourth Edition*, 1966）（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民國 77 年 6 版），頁 55。

¹⁰⁷胡祖慶譯，Kenneth N. Waltz 著，《國際政治體系理論解析》（*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台北：五南圖書公司，1997 年 1 月初版），頁 119 至 123。

綜上顯現可知，中共當前的外交政策雖是「大國外交」，卻是扮演著參與者的角色，其具體作為簡述如下：參與聯合國轄屬機構所舉辦之多邊性論壇會議、活動及並簽署相關條約；以開發中國加名義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積極加入亞太經合會（APEC）並舉辦各種高峰、部長及各種協商會議；參與亞歐會議、加入東盟區域性組織及召開各種論壇；舉辦各種全球性、區域性之運動比賽、國家社會發展、公益論壇活動，如世界華人論壇、二〇〇八年奧運會、二〇一〇年萬國博覽會等。

「韜光養晦」是鄧小平國際理論中「實事求是」的外交方針之一，旨在「趨利避害」意謂「要隱藏實力並不外露」，尤其是當冷戰後風雲四起的國際環境中，在對外關係的處置上，要不主動採取攻勢及不挑起意識型態之爭，完全消除對己不利的疑慮為前提，以避免不必要的攻訐。是以中共選擇扮演參與者的角色，採取融入國際體系作法，俾爭取國家生存及維護國家安全利益，筆者認為亦可謂為是「搭便車」(band-wagon)。

（二）絕不出頭在維護主權以彰顯大國地位

國際環境的變化常影響各國的國際地位，而中共自建政後以來，綜合國力相對霸權及大國而言實為羸弱，以致處處受到大國掣肘，基此在評估國際體系的格局變遷後，再據以制訂外交政策，以期獲取國家最大利益。針對國際社會常以國際地位區隔國家實力，基此有超級大國、大國中等國家及弱國之分，而「國際地位」係指國際體系中國際行為主體之間，在互動過程中因相互聯繫和作用的關係，而形成的力量對比結構之狀態；亦是謀求國家利益的基本要件與保障，甚是對外政策的基本目標。¹⁰⁸ 舉凡強權大國必須具備經濟、軍事及政治之雄厚的實力及潛力，惟今具其一者亦可發揮相對的影響力。¹⁰⁹

江澤民在上台後，為從「六四事件」後突破中共外交孤立的重圍，首要即在設法重返國際社會，遂採取靈活的外交手腕，藉處理波灣戰事、南斯拉夫內戰、北韓核武問題等國際事件，以「獨立自主」的策略逐步使「中國」重新回到「大

¹⁰⁸陳岳，〈冷戰後中國國際地位的確定與認知〉，（李警治主編，《世紀知交的中國世界：國際政治論文集》）（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6月），頁158-160。

¹⁰⁹Henry A. Kissinger, 《At Peace in Terries Conference》，《News Release. Bureau of Public Affairs: Department of State》，October 10,1973,p7；轉引自胡祖慶譯，Kenneth N. Waltz 著，《國際政治體系理論解析》（*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台北：五南圖書公司，1997年初版），頁169。

國」的國際地位，並發揮「大國」的作用；「十五大」後更是積極的蓄積綜合國力、擴大軍事力量，再藉由「實力外交」策略，俾為中國成為 21 世紀的政治大國、軍事大國、經濟大國的戰略目標，而預作準備工作。¹¹⁰

中共外交部統計，自一九九〇年以來，建交國已由一三七增加至一六五個國家；一九九七年以來至二〇〇二年，國家主席、總理出訪計廿九起，外國元首及首腦訪問大陸計一八〇起；香港、澳門行使國家主權，尤其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地位顯著提高。亞洲金融風暴維持人民幣不貶值，積極參加國際裁軍事務、國際環保合作，無非是在樹立獨立自主且負國際社會責任的「大國形象」。¹¹¹ 值此，每當中共外交政策在轉變時，無非旨在國際體系中尋求高度的自主性，藉以凸顯中國之國際地位及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是以元首外交、務實外交、積極簽署國際公約可有見竿立影之效，但即時參與區域安全機制之協調者，可擔任主導者的關鍵性角色，在政治立場上可發揮的最大經濟效益，相關作為：在聯合國安理會在波灣戰爭、科索沃戰爭的投票時，適時採取迴避或是棄權態度；參與朝鮮半島核武危機會談；介入印度、巴基斯坦之核武競賽，並扮演協調者角色。

中國對外策略不僅要以「國家利益」為出發點，更要慮及其他地區與國家的根本利益，俾獲得雙方之間的良性互動與結合。¹¹² 中國正處於崛起的準備階段，並向起飛階段邁進，迴避戰爭已是現實問題，針對廿一世紀應如何有效推遲潛在軍事衝突或戰事發生，關鍵將取決於外交謀略。¹¹³

「絕不出頭」亦是外交方針之一，卻是在「靜觀其變」後的主動作為，旨在保障中國的經濟建設，並充分保握「戰略機遇期」的積極發展，透過務實外交以維護國家主權、彰顯國家地位，期使中共的立場或價值觀點能為國際社會接納，進而創造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和平環境；再者，以主動積極的作為，如推動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建立夥伴關係，營造多極化國際體系的氛圍，並為國際社會所支持與接受。

¹¹⁰魯競，〈江澤民主政後中共外交走向分析〉，《中共研究》第 30 卷第 3 期（總 351 期）（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1996 年 3 月 15 日），頁 26-27

¹¹¹〈我國堅持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 國際地位顯著提高〉，人民日報（北京），2002 年 9 月 30 日。

¹¹²俞正梁等著，《大國戰略研究：未來世界的美日歐（盟）和中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年版），頁 327。

¹¹³閻學通，〈21 世紀中國崛起的國際安全環境〉（北京：國防大學學報，1998 年 1 月），頁 37。

(三) 有所作為重經濟崛起以提升綜合國力

國際體系中大國地位構成要件應具備客觀的基本條件：洲際性的大陸國家、世界人口大國、擁有超過二〇〇〇億美元潛力之 GDP 經濟規模、擁有政治、軍事實力之國家；當今「大國」者雖以綜合國力為概論，但在主觀認定的層次時，強烈企圖與被國際社會接受程度可分為生存力、發展力及國際影響力，其中前二者可謂為綜合國力的實力基礎，而影響力則以實力為基準。¹¹⁴ 自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以來，大國崛起多先創造經濟實力，再充實軍事實力，進而擴張成政治實力，但不可輕忽的是海權擴張形成經濟利益後，促使主要大國成造霸權大業。冷戰後，美國、蘇聯的勢力逐漸撤出亞太地區，致該區域形成權力真空狀態，使得中共在重新審視美、蘇、中戰略三角關係後，積極尋求李德哈特（B. H. Liddel Hart）的「有利的戰略情況」¹¹⁵。

德國學者威廉·富克斯在一九七八年版的《明天的強國》書中，從一九五〇到一九七五年中國大陸的人口增長、鋼鐵生產和能源消費等方面數據，以「定量分析」理論推論，並預言廿一世紀將是中國世紀。¹¹⁶ 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實力，自一九八〇年代起飛後，一九九〇年代後即受世人矚目；尤其是中國中科院以綜合國力作為評估依據，在發表〈二〇〇三年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中指出，二〇〇〇年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綜合國力排名第七，經濟力居第三、軍事力排名第四、外交能力佔第五位。¹¹⁷ 另專門研究綜合國力的中國國際戰略研究機構，其研究顯示迄二〇〇二年止，依據經濟力、科技力、軍事力、資源力、社會發展、政府調控、外交力等積分，排名依序為美國（8530）、日本（4947）、法國（4280）、英國（4096）、德國（4081）、俄羅斯（2901）、中國（2863）。¹¹⁸

日本《朝日新聞》二〇〇三年年底發表社論說，國際性經濟大戲的主角主要由中國來扮演；美國《洛杉磯時報》在二〇〇三年年底撰文指出，中國在亞洲的地位上升。亞洲開發銀行行長千野忠男披露，亞洲的地緣政治實力正在發生變化，中國已成為該地區中的經濟強國，中國的崛起，將對東亞經濟一體化引起促進

¹¹⁴葉自成，《中國大戰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頁52-54、57-59。

¹¹⁵紐先鍾譯，John M. Collins 著，《大戰略》（台北：黎明文化公司，民國64年初版），頁41-42。

¹¹⁶施祖輝，〈國外綜合國力研究〉，《外國經濟與管理》，2000，22（1）：13-19；轉引自綜合國力近代研究的進程，中國國際戰略研究網，<http://www.chinaiiss.org/top/cnp/review02.htm>。

¹¹⁷〈中國可持續發展力排名世界第七位〉，《北京晨報》，2003年2月28日；轉引自葉自成，《中國大戰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頁85。

¹¹⁸〈全球綜合國力 TOP15 排行〉，中國國際戰略研究網，<http://www.chinaiiss.org/top/>。

作用。亞洲開發銀行副首席經濟學家指出：通謂中國將稱霸亞洲，但適時剛好相反，反倒是亞洲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¹¹⁹

「有所作為」是指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及綜合國力，發展至一定程度後，面對崛起與威脅選擇之際，仍要堅持反對霸權及強權政治，惟在面對中共主客觀條件日益成熟強大時，應尋求有利的戰略平衡原則，永遠與第三世界國家、發達中國家站在一起，堅持不稱霸、不當頭、平等互利原則，以合作創造共同利益，終期是在維護國際格局的和平，國家發展的穩定，此是「自助」(self-helping)。

第四節 夥伴關係與建構國際新秩序

「國際秩序」是國家在權力基礎上的產物，強調利益基礎與規則體系的協調性，對共同目標與共同規則的認可，並且在此基礎之下，形成及建立的共同預期與共識性。¹²⁰ 此亦是國際社會中主要大國或國家集團在一定規則及目的之相互作用，或以戰爭手段或以強權和法律為依據，所共同追求的相對穩定的共同目標，以及在協調下的相互間的平衡利益。基此，中共自一九八〇年代即不斷主張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下，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惟面對後冷戰時期的國際體系時，又因各大國之間不可避免會產生各種利害衝突，致使中共採取強權戰略(The big power strategy)並以「權力平衡」為立足點，倡議國際體系朝向多極化發展，以在各主要強權大國之間獲取利益。¹²¹ 本節主要在探討中共在國家利益的基礎上，開展「大國外交」並以此架構「新安全觀」及「夥伴關係」後，無疑是在為「多極化」的國際格局，建立以中共為核心的國際新秩序。

冷戰後，國際局面臨調整的歷史機遇期，中共施行「改革開放」的經濟政策後，導致綜合國力急遽上升，惟在面對現實的國際環境時，國家崛起並非一朝一夕，國家整體國力的發展亦非一蹴可幾，所以在建設起步的階段，勢將難免面臨與現存國際體系中的大國，甚至霸權國家，對於現行的體制有扞格或抗衡之事

¹¹⁹ <外報評論：中國崛起在改變全球經濟政治秩序>，新華網，2004年1月2日，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xinhuanet.com/home.htm>。

¹²⁰ 同註23，頁194；轉引自王傑主編，《國際機制論》(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版)，頁30。

¹²¹ 由冀，<後冷戰時期中共的亞太政策>(後冷戰時期亞太集體安全國際研討會論文摘譯六)，《國策期刊》第111期，1995年5月6日，http://www.inpr.org.tw/inprc/pub/journals/110-9/m111_7.htm。

件；至此新興崛起國家基於國家利益，究竟是挑戰或是合作，不僅影響國家在未來國際格局中扮演的角色，更將影響國家在國社會中的現在及未來的地位。基此之故，中共在以經濟建設為核心的國家大戰略下，即於一九八〇年代起分與美、英、日、法、德等主要國家，以及與周邊國家及第三世界國家重新建立邦交或復交；一九九〇年代起，更是積極的加入以聯合國為主的國際組織，並簽署國際公約等，此舉無非是在為建立新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在佈局。

國際體系或是國際秩序存在自身平衡或是動態平衡之中，隨者體系內國家之間的結構性變動，而相互影響；「維也納會議」（Congress of Vienna）則是開創國際秩序，並將合法性、權力平衡、共同價值觀及均勢外交，共同結合後限制國家能力。¹²² 在此架構下，中共前外長錢其琛指出：國際新秩序必須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但是隨者世界朝向多極化發展，才能實現和平、安定、公正且合理的國際新秩序。中共對「多極化」的看法則是基於《聯合國憲章》所規範的主權平等、互不干涉內政等國際關係基本準則，推動及發展世界多極化，並非針對特定國家，也不是重蹈列強爭霸的覆轍，而是推動國際關係的民主化，促進世界各種力量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加強協調對話，不搞對抗，共同維護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發展。¹²³ 是以「多極化」與「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兩者的關係，實為一體的兩面，中共在處理上，可以交互運用並作為外交策略方針。

針對中共領導人近年以來對建立國際新秩序的重要公開講話，隱然可知中共面對「一超多強」的國際格局，在建構多極化體系及處理國際事務的運作上，朝向透過聯合國及既有的國際體制的方向操作，但不可忽略的是中共自主性發起的各種以區域性為宗旨的機制、以中國大陸為主體的政治經濟性活動，基此，中共建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無非是在兼顧「國家利益」及「權力平衡」的體系下，以「相互依存」的經濟脈絡積極營建和平的國際環境，以全力發展經濟，進而建立國際民主化下的多極體系制度，直至崛起後獲取國家最大利益，並成為國富民強的大國；是以筆者簡單歸納，中共所欲構建的「國際新政治經濟新秩序」作為，經整理如下：

首先，中共海軍艦隊進行區域及全球性巡弋，此舉顯示中共海軍已由藍水向綠水邁進的能力，進一步彰顯海權擴張的企圖。重要活動是於一九九七年二月廿

¹²²丁永康，《中共的國際新秩序：理論發展與實踐》（台北：政治大學東亞所，民國 90 年 5 月），頁 30。

¹²³<中國對多極化發展的看法>，中共外交部，2000 年 11 月 7 日，
<http://www.fmprc.gov.cn/chn/wjdt/wjzc/t3466.htm>。

七日以自製的「青島」號導彈驅逐艦為主的艦艇編隊，首度前往泰國、馬來西亞、金和菲律賓三國訪問；一九九八年四月九日組成艦艇編組首訪紐西蘭、澳大利亞等大洋洲國家；二〇〇〇年八月廿一日則首次訪問加拿大；二〇〇二年五月十五日首次橫跨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途經十五個海和海灣，十四個主要海峽和蘇伊士、巴拿馬運河，總航程三萬多海浬，後者更是中共海軍艦隊首次進行環球航行訪問。¹²⁴

再者，彰顯中共自一九五六年計畫發展航太科技後，一九六〇年火箭發射成功，一九七〇年繼蘇聯、美國、法國、日本之後，成為第五個自主發射人造衛星的國家，二〇〇三年十月十五日繼蘇聯、美國之後，成為舉世第三位完成載人太空船（神舟五號）發射成功的國家。¹²⁵ 雖然神舟載人太空船在整體科技上，仍然落後美、蘇兩國甚多，但發射成功卻象徵中國大陸的經濟實力、綜合國力、科技實力已達到相當水平；相對於海權的擴張，僅是大國之間的落後追趕，至於太空權躍進，卻是領先局面，顯現在國際政治權力角逐中，似已逐步佔據先機。

三者，申辦二〇〇八年奧運會，此舉對中共提升國家整體形象，具有正面性的意義，尤其是體育競賽的勝負，經常觸動與賽國民眾的愛國心，是以自一九九八年十一月起，展開北京申辦二〇〇八年奧運會活動的序幕，直迄二〇〇一年七月在莫斯科召開的國際奧委會第一一二次全體會議時，中共前副總理李嵐清與會強調，申辦係希望通過舉辦奧運會，加強與各國的體育、文化交流，增進與各國的友好交往與合作，為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更大貢獻。嗣後並獲同意取得主辦權。¹²⁶

四者，申辦二〇一〇年世博會，此是因中國大陸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社會穩定，人民生活不斷改善，為與世界各國加強經濟、文化、科技交流與合作，進而「瞭解世界、走向世界、融入世界」，遂自一九九二年起向設址總部巴黎的國際展覽局（簡稱 BIE）申請舉辦世界博覽會，期間並於一九九九年成功舉辦屬專業性的昆明世界園藝博覽會，另是年更成功獲准於二〇一〇年在上海舉辦綜合性的世界博覽會。¹²⁷ 上述活動皆已進一步提升中國的國際形象和地位。

¹²⁴ <進行環球航行的「青島」號導彈驅逐艦>，《艦船知識》，轉引自<我海軍「青島」號驅逐艦的4個首次出訪>，2003年7月28日，華夏經緯網，

<http://www.huaxia.com/zt/2002-20/92728.html>。

¹²⁵ <神舟五號發射成功>，中國互聯網新聞中心（北京），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zhuanti/250671.htm>。

¹²⁶ 2001年申奧大事，新北京新奧運，北京奧申委，http://210.75.208.159/xwzx/sads/xwzx_sads.htm。

¹²⁷ 史軒楚，<走進世博會>，《求是》雜誌總332期（北京：中共中央委員會，2002年4月1日）。

五者，中共為積極參與國際安全，自冷戰後期即積極參加聯合國的裁軍談判，並發表《中國的軍備控制與裁軍白皮書》、《中國的國防》等系列白皮書；為基於世界和平，即於一九八五年（一〇〇萬）、一九九七年（五〇萬）及二〇〇四年（二〇萬）主動發布裁軍；另為凸顯為國際社會的負責任大國，以及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大國地位，更自一九九九年派遣民事警察等，參加聯合國的維和任務。

六者，為履行國際社會公民義務，中共當局基於重視及保護人權，簽署包括《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等十九項國際人權公約。另發佈《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中國海洋世界的發展》；簽署《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渥太華禁雷公約》，發表《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的聲明》等。在在顯示中共對於國際社會的積極介入，並已進入社群體制作為改善外關係，以建立國際新形象的起始點。

七者，中國大陸經濟體逐年擴大，近年來的經濟成長，更是連動全球的市場經濟，是以冷戰後國際社會積極拉攏中國大陸外，中共亦積極加入各種全球性或區域性的經貿組織，透過合作帶動雙方的互利，首開是加入世界經濟貿易組織（WTO）影響最巨；再為參與加入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雖為非正式的元首外交活動，卻可利用開會期間，進行非正式管道高峰會議，針對政治、經濟、軍事、安全等各項議題，進行多邊或雙邊性質的廣泛討論，如柯林頓及江澤民商討解決亞太區域安全問題、九一一事件後發佈反恐宣言等。另中共更是自發性的擬與東盟、日本、韓國建立區域經濟合作組織。

八者，成立區域性對話合作組織，此為中共主張國際體系朝多極化發展的架構下，基於「新安全觀」的策略，先解決周邊安全問題，遂與俄羅斯及中亞五國針，成立對話機制，再衍生為「上海合作組織」，旨在促進地區的安全、穩定和繁榮，推動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¹²⁸ 另中共自行成立「博鰲亞洲論壇」，旨在反映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亞洲各國希望對話，尋求

第7期)，<http://www.qsjournal.com.cn/qs/20020401/GB/qs^332^0^18.htm>。

¹²⁸江澤民，〈深化團結協作 共創美好世紀〉，《歐亞研究雜誌》，（北京：中國社科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http://www.cass.net.cn/chinese/s24_oys/chinese/News/Subject/Shanghai/13553.htm。

合作，實現共同發展的時代要求；至於中共的根本立意是以此「立足於亞洲的論壇」（Boao Forum for AISA）而非「亞洲論壇」（AISA Forum）。¹²⁹

九者，中共為建構多極化的和平共處的國際新秩序，先是透過中共領導人以出訪周邊或重要國家的時機，發表各種方式的政府聲明，並針對雙邊在平等、協座、互利、互信的不同基礎上，建立符合各自國家利益的夥伴關係；面對在後冷戰時期，倡議「一超多強」同時，為避免與美國產生無謂的爭議，藉由「反恐」名義，呼映國際社會應攜手合作、共同努力，並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以反對霸權主義及強權政治，其實最終是在避免影響和平崛起。

筆者針對上述中共自發性的建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作為，彙整圖表（表：2-6）如下：

表 2-4：中共建構的國際新秩序概述表

	具 體 作 為	目 的
炫耀硬性綜合國力	進行區域及全球巡弋	擴張海權
	神舟五號升空	競爭太空權
彰顯軟性綜合國力	舉辦 2008 年奧運會	交流、合作、和平
	舉辦 2010 年世博會	瞭解、走向、融入世界
參加國際裁軍會議	發表國防白皮書	維護世界和平
履行國際社會義務	簽署國際公約	建立新安全觀
加入國際性經貿組織	參加 WTO、APEC	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
成立對話合作組織	上海合作組織、博鰲論壇	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
建構和平共處	夥伴關係、發表宣言	建立多極化格局

資料來源：筆者自繪

¹²⁹郭楊，〈博鰲亞洲論壇〉，《求是》雜誌總 334 期（北京：中共中央委員會，2002 年 5 月 1 日第 9 期），<http://www.qsjournal.com.cn/qs/20020501/GB/qs^334^0^20.htm>。

第五節 小 結

鄧小平的國際政治理論，旨在強調「實事求是」，是以中共在冷戰後的國際政治策略及相關作為上，皆是以鄧小平訂定的廿八字外交方針，作為對外關係的攻守進退準則依據；惟因國際環境及情勢的變遷，以及國家利益與權力平衡的考量，是以中共的對外關係及策略，並非一成不變，再者領導人的決策風格不同，亦會影響整體的外交政策，綜觀江澤民強調後冷戰時期，大國權力變遷的機遇與挑戰，遂主張大國外交與睦鄰政策，而胡錦濤在後冷戰時期，為避免與強權形成衝突，遂倡議「和平崛起」，但在國家利益的核心價值、政策目標及長期利益下，都是以發展與安全、開放與接軌、國富後崛起為基調；至於具體的外交路線上，旨在融入國際體系，維護國家主權及彰顯國際地位。

針對中共在冷戰後的國際處境，似與美國建國之初有類同之處，即國際體系的霸權強敵英國，對北美洲大陸虎視眈眈，另南北邊鄰土皆為法國與西班牙殖民地，當時惟有不捲入歐洲國家糾紛之中，才得以自保，所以美國華盛頓總統在「臨別贈言」中指出：「歷史與經驗證明，外國影響是聯邦政府最壞的敵人之一。……我們的正確政策是要避免與外在世界的任何部分締結永久的聯盟。」¹³⁰；基此，中共建政以來主張「獨立自主」及冷戰後倡議「和平外交」政策，似與美國的「孤立」(isolation)主義有異曲同工之妙。

美國在建構「雅爾達體系」之初，即不斷主導建立聯合國 (UN)、世界銀行 (WB)、國際貨幣基金 (IMF) 等政治性、經濟性的國際組織，藉以建立二次大戰後及英國霸權瓦解後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其在建立的同時，亦與相關國家簽訂雙邊條約，建立同盟或友好合作關係；是以中共亦依循上述模式，先期利用經貿交往活絡雙邊國家往來，促成務實外交或大國外交，再逐步建構以「新安全觀」為議題的各種夥伴關係，此舉無非是在爭取中國大陸已在國際社會中重新站起來，並真正是多極化的國際體系中，且是具舉足輕重的一極。

¹³⁰ 邢福泉，《新國際關係論》(台北：黎明文化事業，民國 73 年版)，頁 145-146。